
我们党为什么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

欧阳淞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5年的光辉历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起来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这一重要论述，启发我们思考“我们党为什么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这样一个重要而又严肃的问题。

三件大事的完成和推进，是党和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结果

9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是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一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真实写照。9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但我们党总是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精神攻坚克难、力挽狂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遭遇大革命的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很快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风暴。正当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时，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残酷的考验面前，红军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付出巨大伤亡，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就在这时，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起来。面对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充分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团结全国抗日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又领导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面对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匪特，面对接管大城市之后的一系列难题，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党和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局面很快得到控制，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再往后，怎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

义的转变,怎样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样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怎样捍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场场考验又陆续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党和人民也逐一向历史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在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艰辛历程中,有党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这两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发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有遵义会议召开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等等。党和人民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备尝艰辛而愈加成熟,充分体现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达胜利誓不罢休的英雄气概。

毋庸讳言,9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也走过弯路。习近平同志强调,对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失误和曲折,应着重分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和制度。要看到,从历史发展的长远看,党的错误、失误和曲折终究只是一时现象,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坚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完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对党和国家长远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党之所以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是因为党的事业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党的建设把党锻造得坚强而有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作出正确解答,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定信仰;哪条道路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它就会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非凡历程和光辉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正是创造这种理论、找到这条道路的政治力量。

从党的事业角度看,党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主要是因为“四个符合”: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广泛牢固的群众基础;符合时代潮流,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四个符合”,归结起来就是符合历史潮流、时代潮流、发展规律和人民意愿。

从党的建设角度看,党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主

要是因为“五个注重”：一是注重党的思想建设。重视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重视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重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重视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重视学习，使党能够不断适应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二是注重党的组织建设。重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建设，强调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党的组织路线，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各级党委的建设以及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使全党始终保持超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注重党的作风建设。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倡导党的优良传统，使党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四是注重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动摇；重视长期执政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经济建设和反对腐败两手抓、两手硬。五是注重党的制度建设。重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重视党内选举、监督和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与有效执行；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在这“五个注重”中,我们党特别注重贯穿其中的政治建设。五大建设的每一个建设,都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严格的政治要求。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重视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并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在党内教育中,强调教育内容的政治性;在党内生活中,强调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原则性;在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制度建设中,强调党的集中统一。政治建设的加强,使这“五个注重”有了主心骨,使整个党的自身建设浑然一体,并使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有序衔接,不断为党的事业向前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进一步说,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具备“四个符合”,党的建设之所以能做到“五个注重”,最根本的在于载入党章的党的性质、理想、宗旨和目标是明确的、科学的,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就党的性质而言,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决定了党必然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既能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又有超强社会影响力和巨大动员组织能力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党的理想而言,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

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崇高和精神支柱的坚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在胜利和顺境面前就不会骄傲和急躁，在困难和逆境面前就不会消沉和动摇，就能经受住任何风浪和困难的考验。就党的宗旨而言，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了人民的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就党的目标而言，党总是依据形势的变化制定每个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有了战略目标，全党就会有更强的战略定力、更清晰的战略蓝图、更有力的战略措施、更主动的战略配合、更理想的战略成果。正因为拥有这些根本依据和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成为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先进政党。

通过对党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历程的回顾，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

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里所说的“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指的就是我们党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的壮丽征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和落实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这3年多的历程是我们党95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充分表明:我们党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传统优势得到了有效继承,而新的优势正在得到培育、得到聚集、得到发展,正在显示并将不断显示其巨大的正能量。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带领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的一份新的答卷。

这3年多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

厚的历史渊源、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坚实的道路、理论、制度基础,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3年多的实践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有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真挚的爱民情怀和坚忍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值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度信赖。这3年多的实践还充分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不懈追求,就一定能够如期到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回顾9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战胜风险、力挽狂澜的实践,我们有理由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心系人民群众、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征程中,一定能够永葆青春活力、战胜各种困难、创造更大辉煌!

(选自201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 微信扫一扫,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尹汉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回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战略部署。《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是指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一、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可以从四个方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看。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政治制度是社会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二是从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看,虽然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三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为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位,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因此其反作用常常表现为决定性作用。四是从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看,政治制度一经确立,便是顶层设计,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政治制度选择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过,在现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不少见。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这一选择不是在几种政治模式中作出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探索尝试过近现代所有政治模式之后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五”。第一个“五”是讲辛亥革命之前的五大事件,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这五大事

件的时间是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这一段。中国的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太平天国发生在1851年—1864年;洋务运动大概的时间是1860年到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戊戌变法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1899年;清末新政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的1901年发生的。

第二个“五”,是尝试过的五种制度形式。这五种制度形式是: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对应的历史事件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戊戌变法历时百日,被慈禧太后所镇压。清末新政以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进行改革为标志。慈禧太后借鉴日本的宪法,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改革最终也归于失败。帝制复辟搞了两次,一次是袁世凯,一次是张勋。都很快失败了,说明封建统治早已不得人心了。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也是不成功的。在此期间,中国曾出现过多党林立的局面。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各种新成立的党会达682个之多。人们“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从1912年到1948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出现过八位总统,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

第三个“五”,是后面总结性地讲到的五种革命或改

革类型。第一,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第二,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第三,旧式农民战争。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这些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说,这种选择不是多选一、二选一,而是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制度都尝试过了,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之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特殊事件发生后的偶然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

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随即背叛革命,与共产党反目。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中,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一些建设,现在有人将此称为“黄金十年”。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实现现代化。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历史不能假设。希望日本不侵略,不发动侵华战争,是一厢情愿的。

二是1937年之前,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不仅是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西方列强在中国也有殖民利益存在。

三是1927年至1937年,新军阀割据出现,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不可能实现近代化。

四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其不可能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页)

五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确曾寄希望于将西方的政治制度运用到中国,改变中国当时的悲惨命运。但是从外部环境看,列强不愿意放弃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独立;从内部条件看,资产阶级很弱小,难以担当起历史重任。辛亥革命以后议会政治模式的种种丑态也让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所谓民主模式的怀疑。

3.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经过探索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我们同苏联在国家结构上就有很大区别,苏联是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也有不同。最高苏维埃是两院制,包括联盟院和民族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三、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出发深刻领会“四个必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深刻领会“四个必须”,应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联系起来思考。要把握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保障其运行的体制机制,把握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出发思考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关键。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等基本制度。还包括政府、司法、群团和社会组织等系统,包括维系整个系统运转的民本思想、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贤能政治等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有助于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四个必须”。

1.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性质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讲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决不是先入为主,也不是自封的。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历史地位和承担的使命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从党的性质来认识。政党政治在世界近现代政治史中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比较,从性质上讲存在两个大的差别。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 and 领导核心,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西方政党是议会竞选制度安排下形成的政治派别,是用于竞选的工

具。

二是从党的历史地位形成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通过比较之后作出的选择。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参与民主建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在议会政治框架内,通过竞选取得一段时间执政资格的。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常常用所谓的合法性来误导我们,他们讲合法性,主要是讲选举程序的合法,回避合法性的根本应该是人心向背。实际上西方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是竞选工具,已经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组织危机和辨识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妨将中国与印度、与俄罗斯作一比较。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印度是西方认为实行西式民主的典型的新兴国家。新中国1949年成立,印度1947年独立。1952年,印度人均生产总值是52美元,中国是48美元。60年后,中国人均生产总值5414美元,印度人均生产总值1389美元。又比如,俄罗斯原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

部分,苏联解体后,照搬西式民主制度,地位不升反降。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即1992年,俄罗斯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八,中国排名第十,到2010年,俄罗斯排名下滑到第十,中国排名上升到第二。

三是从肩负的历史使命来认识。当前,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革命需要领导核心,建设需要领导核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事实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围绕如何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做到“三个保证”和“四个善于”。“三个保证”包括: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四个善于”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

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这些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认真贯彻。

2.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也是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讲了具体要求。一是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三是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凝聚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既是生命线,也是科学的工作方法。这里强调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在国家各项工作中的体

现,又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生问题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首要问题。根据“亚洲价值观调查项目”的研究发现,75%以上的大陆和台湾居民的民主观都是以民生为核心的。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关于中国人的民主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类似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比较接近,即中国百姓眼中的民主其实是民生,以民主的语言表达民生的诉求。即令如此,我们仍然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我们要从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高度,看待并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民主与法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第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工作方法;第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

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了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二是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开展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三是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四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4.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这就从制度建设和制度运行两个方面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作用。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所确定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中,体现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

期,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利用民主集中制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发展,而且利用民主集中制不断地解决了党自身出现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在党的建设、国家建设中,民主集中制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维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支撑,是维系这个体系正常并有效运转的体制机制。真实地体现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理国家的政治关系,既能够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又能避免无序民主、无效民主和民粹主义;既能体现政治属性上的民主,又能反映政治伦理上的集体之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关键在集中。一方面,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另一方面,没有集中指导,民主就是无序的;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正确的集中,那么民主就是无效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程序安排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有效、健康地运行。

四、系统地把握现代政治文明的评判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了评价政治制度的八条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

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首先所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然后围绕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提出了主要评价标准。是不是民主的、是不是有效的,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评价内容。是不是民主的,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种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是否有效,同样是判断其是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这是对西方某些政治学者所宣扬的“程序至上”标准的有力回应。西方有的政治学者认为,只要选举程序合法,哪怕所产生的政府是无能的、无效的,那么这个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事实上,如果通过一定程序选举不了有为有效的政府,那么这个程序的科学性就应受到怀疑。无效的制度甚至无序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也有悖于现代政治文明,说它是民主制度也毫无意义。

可以从这八个方面的主要评价标准看我们制度建设的成就。

第一条,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对照这个

标准,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我们的制度。一是我们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二是选拔与选举相结合,从总体上使执政团队的能力素质得到了保证;三是权力配置上的分工与协作避免了决策上的相互掣肘。在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具有科学性。中国具有贤能政治传统,把选拔与选举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经历与政绩,实现了程序上的合法性与实质上的正当性的统一。从总体上避免了党争、钱举、低能和过度功利的短期行为,也避免了某些西方国家权力制衡机制演变为否决机制的后果。

第二条、第三条,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这两条标准所判断的是民主的实质,也可以说是人民民主制度与其它的民主制度本质区别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涉及普通民众利益的问题,有畅通的诉求渠道,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团队会主动地研究并制定政策加以解决。中国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着眼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立法和涉及民众利益政策调整时,能积极主动地、广泛地听取意见。只要财力和社会条件具备,公共政策出台就没有障碍,特别是没有明显

的利益集团的阻滞。这些与某些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条,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此,我国的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 and 力量。

第五条,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遵循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严格执行法律程序和决策程序,坚持政务公开,既避免了议而不决,又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六条,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我国具有重教重才传统,广泛多层的人才选拔机制,能够通过公平竞争使各方面优秀人才不断地进入到领导和管理体系。

第七条,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前面提到的全面依法治国应该是有力的回答。

第八条,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我国有多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有严格的权力约束和反腐败措施,对权力运用的约束和监督是有力、有效的。

由此可见,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们可以很有底气地说,中国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体系是民主的、有效的。

五、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民族统一的国家,西方不少国家定型的历史只有二三百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考察,在极力推崇美国民主的同时,也有“民情说”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做法,在欧洲国家未必可以照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当前,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但是,完善和发展必须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1.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水平。

2.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跨上新台阶,我们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中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我们要认真总结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3.要坚持问题导向。

既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又要解决好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带来的新问题。比如,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比如,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等。还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新问题,比如普通劳动者民主权利的实现问题;比如,如何避免按财富分配政治资源的问题等。

(选自2016年第11期《红旗文稿》 作者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微信扫一扫,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

实践已证明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与伟大

李慎明

十月革命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十月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有人还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个“早产儿”,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出发,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势,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做出过预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受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的初稿,恩格斯本人并不满意,后被他在1847年12月

—1848年1月间同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所代替，而《共产党宣言》中没有再使用“同时发生”的提法。在这以后他们也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注62）。恰恰相反，在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俄国。他们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

我们知道，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差半个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集中和垄断的思想，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从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任何个人、政治派别或阶级政党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十月革命决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压迫，内部政治矛盾异常尖锐，外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列宁所讲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

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中首先发生并获得了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决不在于十月革命道路本身,而恰恰在于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逐渐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我们决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解体而谴责为人类开辟崭新道路的十月革命本身。

通过造谣攻击列宁进而否定十月革命同样站不住脚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也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斯大林;到了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后期,列宁也成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的目标。他们捏造出很多谎言,所谓“列宁是德国间谍”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

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俄]《莫斯科新闻》，2007年6月1日)。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首先,列宁回国根本不是德国政府的“指示”,而是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回忆录》中,记载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1917年3月底,“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当立即出发!’”这就是铁证。

再有,列宁回国前确实也答应了德国政府的某些条件,但这完全不等于是充当德国的间谍。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国与俄国是交战国。德国政府允许列宁一行40余人途经德国回国时,曾设立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回国者必须在俄国展开“反战鼓动”,二是归国者要争取俄国释放与其同等数目的奥地利或德国战俘(克鲁普斯卡娅著,哲夫译:《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页)。

关于“反战鼓动”:反对参加一战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列宁和党组织早就认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霸的非正义战争,这样的交战只能给俄国和德国人民带来痛苦。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政府的“反战鼓动”出发点和目的也截然不同。

关于“争取释放战俘”:双方的协定里只是注明“争取

释放”，并非必须做到，而返回国内的40多名俄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

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上述两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精心抛出的谎言往往有相关所谓的“证据”支撑。那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之说的所谓证据何在呢？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临时政府不仅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又以伪造的所谓的“西逊文件”作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支柱性论据，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缉列宁。一些追随临时政府的报刊大加渲染。这也就成了“列宁是德国间谍”之谎言的由来。对此，列宁十分气愤，一度曾坚持要亲自出庭以揭露敌人的诽谤。但为了保护领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断然决定不让列宁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兰边境指导十月革命。就是在此时此地，列宁写出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后来，苏联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西逊文件”作了大量详尽的研究。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博列夫、斯塔尔采夫，甚至连著名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关键性文件，却是出自俄国旧式打字机，是来自俄国本土的伪造（[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

俄国2009年和2012年先后出版的官方历史教材——俄

国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历史 1900—1945》，全面批驳了“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谎言，明确指出：“上述谎言不过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些反动报刊散布的虚构神话”，“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参见吴恩远：《苏联历史的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 页）。

俄罗斯各界近年的反思也有力地证明着十月革命的正确

自 1999 年起，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连续多年在列宁诞辰前夕（4 月 22 日）就俄罗斯民众对列宁的历史作用评价作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对列宁的评价稳中有升。

2011 年，苏联解体 20 周年的前后，《俄罗斯报》随机调查了 254 位各界民众。问卷共有五个题目，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天，说到苏联能使您联想到什么？当你看到缩写词 ССС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的缩写）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90% 以上的答案是颂扬和怀念。2016 年 3 月，俄罗斯人以执政前后国家的总体情况、人口数量、居民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球影响力等十项标准，评价 20 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十位领导人的功过，包括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列宁、斯大林、赫鲁

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梅德韦杰夫、普京。结果显示,列宁、斯大林、普京的上述得分均为正面,并列第一。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9项评价均为负面而位居最后。

对于苏联的解体,普京总统用“灾难”来形容。他明确反对在苏联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表示: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就在2016年1月25日,普京向来访者透露,他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苏联共产党员的党证,并且非常喜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而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曾有所“忏悔”。2016年5月2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戈尔巴乔夫说,“我很感到遗憾,一个拥有无限可能和丰富资源的国家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大多像我一样……对于这个国家的解体也深感惋惜。”

笔者曾与刚刚去世不久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过几次深入长谈。他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斯言十分中肯。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引用“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次提醒全党要认真汲取苏联亡党亡国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即将满100周年之时,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深刻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对于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选自2016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微信扫一扫,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